

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的社会语言背景：对理解非洲语言接触的贡献

初步考虑

语言学研究，尤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揭示了巴西语言生态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在巴西，不仅存在着众多巴西葡萄牙语的变体，还有数百种其他语言，包括土著语言、移民语言以及手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民族和文化关系网络。研究表明，在某些地区和社群中，语言接触现象显著，葡萄牙语并非总是作为母语被习得。这些特殊情境往往存在于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或者存在于如移民、听障人士和土著群体等使用少数语言的社群内。绝大多数巴西人是单语使用者，他们只掌握和使用葡萄牙语，葡萄牙语不仅是全国的官方语言，更是国家的通用语言。

葡萄牙语在巴西的主导地位反映了过去几个世纪语言政策的有效性。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将统治强加给当地人民，并试图消除当地的文化和语言。然而，并非所有的前葡萄牙殖民地都经历了与巴西相似的语言配置过程。由于与葡萄牙领土和利益相关的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在本文中不作详细讨论，这些殖民地的社会语言环境与在巴西观察到的情况大相径庭，其中双语或多语现象是常态。

大量巴西人之间的语言和社会互动表明，无论是在文化语言还是大众语言层面，葡萄牙语是他们唯一的交流语言，这种现象往往造成一种误解，即认为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PALOP）的语言配置同样呈现出单一语言的特征，并且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前葡萄牙殖民地都具有相同的语言结构。然而，与双语和多语社群的实际接触揭示了一种与巴西单语使用现实不同的语言景观，并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讨论，来探索超出这些环境之外的葡萄牙语特征。

值得探究的不仅是葡语在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多样性，还有这些国家的语言配置，以及语言接触和语言共存的背景特征。这些特征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在某些社群中，尽管葡萄牙语是官方用语，但它可能并非是通用语言或者最主要的使用语言。

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PALOP)的语言配置展示了语言间共存的不同形态，这也表明了语言共存的多样化形态以及葡萄牙语在各国所承担的不同功能。这些功能深受不同文化和社会历史关系网络的影响，语言接触在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或全境均表现得极为活跃。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现实与巴西的语言状况存在显

著差异,也提示我们在对这些国家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时必须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的葡萄牙语使用者进行初步的社会语言学描述。研究聚焦于五个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安哥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佛得角。分析将涉及语言接触的特定方面、不同语言在各自域内的角色、社会语言学特征,以及非传统社会因素,如种族等。

研究为描述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的葡萄牙语变体提供初步支持,并为开展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与巴西、欧洲和亚洲的葡萄牙语变体研究提供可行性支撑。此外,也为更深入地认识和保护非洲丰富的语言多样性——即“语言马赛克”——奠定了基础,其多样性不仅涵盖了作为欧洲语言移植到非洲的葡萄牙语,还包括非洲数百种土著语言,以及在殖民接触情境下形成的各类克里奥尔语(crioulas)。

目前实际表明,在开展群体内葡萄牙语变体特征研究之前,需要深入探究以下方面:(1) 双语或多语使用者的比例;(2) 官方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差异;(3) 使用最频繁的工作语言;(4) 所习得的第一语言;(5) 葡萄牙语习得的年龄和环境背景;(6) 家庭环境中使用的语言;(7) 社会变量如种族等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基于前期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本研究初步探讨了非洲官方葡萄牙语国家(PALOP)所经历的复杂现实,重点关注语言接触和多语现象,以及不同语言在各国所发挥的不同功能。基于对PALOP地区进行的调查,本文进一步提供了初步的社会语言学特征描述,涉及种族、第一语言、父母语言、最常用工作语言和接触语言等多项数据。这些结果有助于比较这些国家的语言特征,为构建语言样本库和进行非洲葡萄牙语变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1、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社群

对不同语言接触及语言多样性的描述和分析,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语言学从其产生之初就将语言视为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现象,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社会语言学始终聚焦于语言在集体中的多样化使用情境,并观察语言互动体现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

各类社会群体不仅在同一种语言的使用上表现出异质性,还在不同语言的使

用上展现出多样性，尤其是在语言接触的背景下。这种现象在具有显著种族多样性或大规模移民流动的地区尤为常见，例如非洲大陆的部分区域。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历史中的普遍现象，起源于不同语言群体之间所建立的各种关系。

根据 Petter (2015) 的研究，在非洲地区，后殖民时期的语言接触因各国政府的语言政策而呈现出不同的角色。这些政策直接导致了语言使用的选择与分层，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位于更高的地位，而少数语言的使用范围则被限制在家庭环境中，逐渐趋于边缘化甚至消亡。作者指出，之所以选择前殖民地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主要是因为这种语言与特定的民族或种族群体没有直接关联，有助于实现国家统一，同时也便于国内不同社群间的交流。而地方语言通常与特定区域和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群体有关，缺乏可用于行政工作和教育的书写系统。在这种后殖民的语言格局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人口和社会经济优势”的主导语言。尽管这种语言并非大多数人的母语，却成为了通用语，被广泛用作第二语言。因此，社会中普遍存在双语或多语现象，各民族语言、地方语言以及通用语被同时使用。这些“语言大熔炉”的具体形态取决于种族语言的数量、“克里奥尔语”的存在、前殖民地语言的推广程度以及社群内主导语言的使用情况。